

中国史学 思想通论

· 总论卷 历史思维论卷 ·



◎ 吴怀祺 主编

◎ 吴怀祺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史学 思想通论

· 总论卷 历史思维论卷 ·



◎ 吴怀祺 主编

◎ 吴怀祺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 历史思维论卷/吴怀祺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211-06300-0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史学思想—思想史—
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773 号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 历史思维论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TONGLUN · ZONGLUN JUAN LISHI SIWEILUN JUAN

作 者: 吴怀祺

责任编辑: 史霄鸿 陶 璐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邮政编码: 350001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30 毫米×990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

字 数: 39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300-0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总 论 卷

题 记 3

第一章 史家修史的主体意识与治史论 11

○

第一节 史家修史的主体意识 11

一、史家修史的追求 12

二、良史忧世的情怀 15

第二节 史家的治史论 17

一、史事、史文与史义的整体要求 17

二、兼综融会以成一家之言 19

第二章 史学二重性与史书的编修 37

○

第一节 史学的二重性 37

第二节 史学二重性的多维思考 43

第三章 四部文化形态与博学传统 52

○

第一节 四部文化与史的因缘 52

一、四部文化中的“史” 53

二、文献的多重意蕴	57
第二节 博学传统与史学思想	60
一、民族史学的博学传统	60
二、博学传统与近现代史学	65
第四章 几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初步思考	70
○	
第一节 从易之三义,说历史是什么	70
一、问题的提起	70
二、从易之三义,说历史是什么	73
第二节 从科学的定义,谈历史学的属性	77
一、经验科学与实验科学	77
二、历史学是科学	79
第三节 历史学功能:以史为鉴与经世治用	81
一、历史借鉴观	81
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	86
第五章 民族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91
○	
一、通变思想	91
二、以民为本的思想	97
三、人才强国的理念	98
第六章 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史学	102
○	
一、全球化趋势与历史走向	103
二、全球化趋势与历史发展的差异	106
三、全球化趋势与研究的新视域	109
第七章 结 语	113
○	

附录 各卷简介	119
本卷主要参考书目	124
后 记	129

历史思维论卷

题 记	135
绪论：思维、历史思维与民族文化	144



第一节 思维与历史思维	144
一、历史思维：中外学人关注的热点	146
二、历史思维的特性	153
三、思维学：一门亟待发展的学科	155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民族历史思维	163
一、从经籍源于史谈历史思维	164
二、诸子学与历史思维	167
三、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大历史思维	169

第一章 象思维、意象思维与历史的解喻	173
--------------------	-----



第一节 从图腾崇拜谈象思维的特性	173
一、图腾崇拜、神话的象思维	173
二、图腾崇拜、神话与先祖追念	174
第二节 意象思维与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	181
一、《周易》意象思维与历史解喻	181
二、关于具象思维、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189

第二章 天人关联的整体思维与历史变化的思考	193
-----------------------	-----



第一节 天人联结的整体思维特性	195
-----------------	-----

一、《周易》：系统的整体的思维	195
二、“究天人之际”：司马迁修史的整体系统思维	197
第二节 天人感应的历史解喻	200
一、天人感应的历史解喻	200
二、天人感应论的整体思维的变化	203
第三章 通变思维与历史大势说	207
○	
第一节 易学与通变思维	210
一、通变思维的理论价值	210
二、通变思维的史学观	214
第二节 历史通识与历史思维	217
一、历史通识的多样性	217
二、通变思维与历史运动大势说	222
三、通变思维的历史变革观	225
第三节 历史运转的元会运世说	232
一、元会运世说	232
二、历史地气运转说	243
第四章 太极说：社会和谐的思维	248
○	
第一节 “诚”：理学思维的纲领性的转换	253
一、太极学说：天人整体思维的深化	253
二、以“诚”为中心的理念	255
第二节 阴阳运转中的和谐	256
一、天人和合的思维	257
二、阴阳和合运转以“人”为中介	258
第五章 史学二重性思维的理路	261
○	
第一节 直笔实录与书法褒贬	261
一、直笔与书法	262

二、《汉书》：正史的二重性思维范式	266
三、直笔的背后	283
四、疑经与尊经崇圣	287
第二节 先王的虚拟性与后王实存性	289
一、关于先王的理想坐标与先王的实有验证	289
二、“不法古”、“不循礼”的思维路径	295
第三节 五行说、三统说与正统论的解喻	296
一、历史运转的五行说	296
二、历史运转的三统模式	304
三、正统论的解读	307
第六章 致用的多样与历史思维的路径	318
○	
第一节 通经致用的思维意蕴	318
一、通经致用的思维模式	319
二、事功之学的经世致用	324
三、畜德致用	325
第二节 稽古与资鉴：思维上的同与异	327
一、稽古论的思维特点	327
二、司马光与王夫之的资鉴思维之比较	332
第七章 “类例”思维的意义	345
○	
第一节 “区分类聚”思维的思考	345
一、史书编纂的“区分类聚”思维	346
二、“类例如持军”的学术归纳思维的普遍价值	348
第二节 清人治学的思维特征	349
一、关于“质测”与“通几”的思维	349
二、清人治小学的思维	354
第八章 兼综百家与成一家之言的求新思维	356
○	

第一节 “述”与“作”的理念	357
第二节 成一家之言	359
一、“学术汇于一”的理路	359
二、成一家之言思维的特点	360
三、史学批评与史学更革以求新的主张	366
四、众手修书与史书的主旨	372
第三节 学术宗旨与独断之学	373
一、学术门户与学术宗旨	373
二、独断之学	375
三、史识与史德	380

第九章 史学近代化与历史思维 384

第一节 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民族历史思维	385
一、社会变动与文化转型	385
二、史学转型与史学近代化	387
第二节 史学近代化与历史思维	388
一、西学的输入与回响	388
二、史学近代化与历史思维	390

第十章 全球视域下历史思维的发展 407

第一节 十七年的中国史学与思维的思考	407
一、历史思维的根本转换与曲折变化	408
二、历史新时期的开放思维与历史认识	411
第二节 历史思维的新发展与史学创新	413
一、科学发展思维与史学创新	413
二、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盟	419

本卷主要参考书目 424

总论卷



题 记

梁启超 1901 年的《中国史叙论》与 1902 年《新史学》发表，作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标志，到现在，是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史学家不断求索，为的是中国民族史学走向世界，但应该说，这个任务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史学是大宗，历史典籍之丰富，恐怕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得了的，但说到史学思想，却是不为许多西方学者所认可。中国史学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失衡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史学家努力向西方学习，这是事实，世界上有新的潮流，史学家总是紧紧跟进，“输入”、“贩运”的说法不同，但说明了中国学人、中国史家，不说全部，至少大多数人，并不保守，并不故步自封。而且确实是在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吸取了新的营养，民族史学发生了以前所没有的变化，可目前的现状是尚未在世界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所以，振兴包括史学在内的民族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民族史学走向世界，不能以狭隘的思维对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固有的民族史学宝库中的精华，同样也应努力吸收其他民族史学的精华。

从深层次上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还要进行跨文化的研究，这些对思考新世纪的民族史学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相当繁重：一是进一步总结好中国民族史学，

特别是总结好民族史学思想。二是在中外史学比较中，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既审视中国传统史学，也分析当前我们的史学；既注意国外某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学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也注意到曾经为推介中国史学的世界学者所做的工作，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学人在宣传中国史学中作出贡献的，我们都要致以深深的敬意。三是在史学大总结中，提出我们的史学理念，不敢说能起到引领的作用，但在世界史坛上，要有中国学人的声音，不能总是处在失语的状态中。

振兴民族，振兴民族史学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强烈的愿望。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史学》中提倡爱国主义的史学，他说：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育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梁氏鼓吹的新史学，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把新史学作为救国大事，把新史学作为振兴民族的大事。

何炳松在1927年初的《历史研究法·序》中，指出中国研究史法著作不多，但不必妄自菲薄，西洋史家之着手研究史法，也不过二百年来事耳。但“吾国专论史学之名著，在唐有刘知幾之《史通》（中宗景龙时作），离今已一千二百余年。在清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乾隆时作），离今亦达一百七八十年。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①。他希望在若干年后，“民族复兴，国家安定，文化工作日新月异，如能和高庸先生、各位教授以及各位学生，促膝围坐，清茶淡酒，纵谈史学，回话当年，那么，我们目前所身受的一切艰苦都已得到无价的心灵的快慰了！”^②

20世纪30年代，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

① 《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5页。

② 《何炳松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04页。

西史学的问题，吕振羽就是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充分肯定，反映出其开阔的历史眼光，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对待中西史学的必要，重视传统并不是无分析地全盘接受，“历史上，相互交替的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不是一刀两断的，而是一种辩证的历史过程。新质是旧质的否定，但不是取消而是扬弃，也就是说，新质产生于旧质的母胎中，吸取旧质构成体中的积极因素而又把旧质革除；而新质是在旧质的内在矛盾斗争基础上发生的，并不是任何旧质的东西之生命的延续或化装”^①。

他对近代文化作出总结，指出：中国自殷周以后，有近四千年的文明历史，在这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哪些东西是优良的传统，这不是可以凭常识去判断，这就要进行科学地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就是说，要把认识民族文化的创造过程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实践过程统一起来。

但过去是优良的东西，到了现代未必也是优良的，未必能充作新文化的构成因素；到现在还有其积极作用的东西，也不能以其原有性质的东西，拿来“生吞活剥”或“凑合”，而是要经过改造，使之成为新文化的构成因素。所以我们应遵循这样一个极端明白正确的方针。^②

新史学家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吕振羽说：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要“迎头赶上”，不再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这对于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来说，便将不同于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文化，将是比它们进步的一种新型的文化，“迎头赶上”便是我们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实践方针。^③

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从世界范围讨论民族文化，目的是创造新文化，使我

① 《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58 页。

② 《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6 页。

③ 《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62 页。

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吕振羽借用孙中山的话，就是要使我们民族文化“迎头赶上”，从而把文化的开放性与先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可以说，新史学家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认识是理性的，但不足的是，在史学实践中，如何贯彻这样的思想，就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或是以西方的学术作为坐标轴，确立中国史学发展方向，评断学术的高下；或是理论上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有较为系统的分析，但在实践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按照原先的认识进行，没有建构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理论。还有一点，是由于大多史学家不了解西方学人是怎样看待中国史学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于他们的正确的、不正确的乃至错误的认识，作出全面的分析。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史学曲解、贬低，他们的议论，引起中国史家抗争。我国台湾史学家曾作出系统的正面的回应。

20世纪60年代，杜维运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留心中西史学的比较，带有民族情感，撰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这本书初版于1981年，全面系统地讨论这方面问题的专著，这是第一部。

作者把西方史学家分成三类，分别地分析这三类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态度。第一类是所谓西方正统史学家，“在欧洲，治欧洲史以及欧洲国别史的史家，往往被视为正统史家（academic orthodox）”。这一类史家观念褊狭，历史的视线不够广阔，欧洲以外的世界及其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占重要地位。西方正统史家论中国史学，是极尽蔑视嘲笑之能事，偶尔也有称赞的语句，但少能触及中国史学的精华。这些史家有汤普森（J. W. Thompson）、瑞查森（Alan Richardson）、艾尔顿（G. R. Elton）、卢克斯（John Lukacs）、浦朗穆（J. H. Plumb）、葛兰特（Michael Grant）、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等。

第二类是西方非正统史家。“所谓非正统史家是治亚洲、美洲或非洲史的西方史家。这些史家视野比较开阔，观念较西方正统史家开明”，但他们对中国史学了解得很少。这些史家有奈芬司（Allan Nevins）、瓦尔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卡耳（E. H. Carr）、魏吉瑞（A. G. Widgery）、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麦尼耳

(W. H. McNeill)、傅尔 (N. E. FehI)、但斯 (E. H. Dance) 等。

第三类是西方汉学家。杜维运以为, 这些汉学家有学术上的宽容, 而又略具基本知识, 他们论中国史学, 有时能发表极为珍贵的意见。如沙畹 (Edward Chavannes)、浦立本 (E. G. Pulleyblank)、毕斯利 (W. G. Beasley)、房德龙 (Van der Loon)、何四维 (A. F. P. Hulsewe)、傅吾康 (Volf-gang Franke)、福赫伯 (Herbert Franke)、杜希德 (D. C. Twitchett)、戴密微 (P. Demieville)、哥芮 (J. Gray)、白乐日 (E. Balazs) 以及瑞特 (Arthur F. Wright) 等。其中, 瑞特是西方维护中国史学最有力的汉学家之一, 1963 年发表了专文《论研究中国历史应用通则的方法》。浦立本在 1964 年编的《中国文化之垂统》一书中, 有一篇是《史学的传统》, 该篇对中国史家司马迁、刘勰以及清人的考据学等发表了精辟的论见。还有浦瑞查德 (Earl H. Pritchard), 他在《传统中国史学与方志》一文中指出: 毫无疑问, 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最久富历史观念的民族。又说传统中国史学发展出自己的历史观念 (conceptions of history)、价值标准 (canons of value) 及方法上的技巧 (methodological techniques) 等。杜希德 1973 年在《铜器时代至满清期间的中国政治与社会》一文中, 对中国史学有许多重要评价。1978 年, 他在《剑桥中国史》的《前言》有两段话, 对中国史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 “中国文化史比西方任何一国文化史, 都更为渊博, 仅略为不如整个欧洲文化史枝叶扶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录, 极为详赡浩繁, 中国的历史学术 (historical scholarship) 已高度发展无数世纪, 且趋于成熟。”又说: “最近西方学者已较全神倾注于中国及日本丰富的历史学术传统 (the rich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不论在过去事件与制度的细密知识上, 以及在传统史学批判的了解上, 都进步甚大。”

《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到 1993 年, 已经出版了三版。杜维运教授于传统史学有精深的研究, 又师从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浦立本, 洞悉西方史学, 这样比照中国史学, 所论自然中肯贴切。对杜氏的著作我们要做历史分析, 重要的是看到他在史著中的振兴民族之心。

杜维运还写有三册《中国史学史》, 旨在撰写一部翔实的中国史学史, 以展现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丛林中所占的地位, 他把《与西方史家论中国

史学》的精神贯穿在这三册《中国史学史》之中。《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册出版于1993年，第三册梓行时间是2004年，如果从《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写作时间算起，是近半个世纪了，他的探索中心是为弘扬民族史学。《中国史学史》的第三册结篇的话是这样的：

平情而论之，中国史学自有其缺陷，然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史学遥遥领先西方史学，是不争的事实。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中国史学趋于式微，也是史学的潮流。当今之时，中国史学界以广阔的胸襟，恢弘的眼光，综合中西史学，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则超越的宏愿与美善的史学，将悠然而出现。经世的大业，不朽的盛事，尽在于此，愿与国人共勉之！^①

汪荣祖教授出版于2002年的《史学九章》^②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后面的五章是对中国史学深入研究的专论。其中第五章《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全面评述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与杜维运著述相比，又有新的视角，注意从史学的属性讨论问题。作者说：

西方学者泛称中国传统史学为“儒家史学”，就像他们视二千余年的帝制中国为儒教中国一样，因为他们以儒家为哲学或宗教，以及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预设前提，认为儒教乃笼罩帝制中国，无所不在的精神面貌。其实，儒家主要教导做人的道理，提出人伦规范与社会秩序，与极权专制并不协调。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帝制实赖法家维持，儒家最多起了制约法家的作用而已，以至于朱熹有所谓圣人之道未尝一日真正行于天地间之叹。何炳棣研究的结论，也认为儒教不论其高贵的价值与人道的效果，一直是传统中国高度集权政权的工具，而非主宰。如果儒家道德主宰不了帝制，又如何主宰史学？然而西方史家往往断言，中国传统史学乃儒家道德的工具，帝国政府更通

① 《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529页。杜氏另著有《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三民书局2008年版）。

② 《史学九章》，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